

杨松年 著

中国文学评论史书写问题论集

港台及海外学人学术系列丛书

丛书主编 龚鹏程

中国文学评论史书写问题论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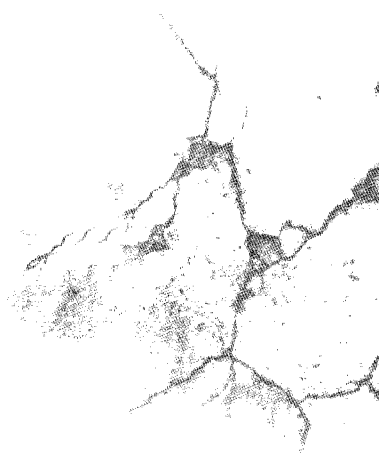
港台及海外华人学术系列丛书

丛书主编 龚鹏程

杨松年 著



華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1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学评论史书写问题论集/杨松年 著.—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

(港台及海外学人学术系列丛书/龚鹏程主编)

ISBN 978-7-5622-4757-9

I.①中… II.①杨… III.①文学史—中国—文集 IV.①I2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65221号

中国文学评论史书写问题论集

杨松年 著

责任编辑: 杜李娟 陈兰枝

责任校对: 李萌

装帧设计: 刘亚宁 杨继龙

编辑室: 教育社科编辑室

电话: 027-67867317

选题策划: 金轮

电话: 010-63703938

社址: 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152号

邮编: 430079

电话: 027-67863040 (发行)

传真: 027-67863291

网址: <http://www.ccnpupress.com>

电子信箱: hscbs@public.wh.hb.cn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湖北鄂东印务有限公司

字数: 200千字

督印: 章光琼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13

版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29.80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 欢迎举报盗版, 请拨打举报电话027-67861321

前言

文学史与文学评论史书写一直是我关心的研究课题。从1971年开始撰写有关中国文学评论史编写问题的博士论文，到1999年撰写新马华文现代文学初编，甚至到现在，我都没有离开这一方面的研究。因此，当龚鹏程教授希望我能整理出一本关于文学史研究的论文集时，我心中即刻想到的就是要整理一本从古代到现代有关文学史书写问题的论文集，而且这本论文集要能够涵盖我在这方面提出的意见以及处理的方法。本书是我要整理的论文集的前一部分：中国古代文学评论史编写问题研究。

我是从1968年开始研究中国文学评论的。当时我到香港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的课题是明末清初王夫之的诗论。这项研究对我后来整理中国文学评论影响很大。其一是研究方法。中国文学评论和其他中国古代著作一样，存在严重的用语语义含混的现象。当时为探索王夫之的诗观，我决定首先阐释有关作品中的主要用语，然后对其诗见进行论析。结果发现，在论述他的作品中的主要用语后，潜存于其用语下的

2 诗论系统也清楚地显现出来了。这带给我在研究方法上一个巨大的惊喜。后来，我在探讨文学评论作者的诗观上，在整理文学理念的发展上，甚至在处理文学史的分期上，多采用这种方法。其二是对文学史书写的看法。当时研究王夫之的诗论，我发觉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书中有关王夫之诗论的论析以及单篇论文关于王夫之诗论的探讨所采用的资料，只是根据其《姜斋诗话》发掘的诗观。无论是资料的采用，还是所发掘的王夫之的诗见，和我所研究的发现都有很大的差距。原因是《姜斋诗话》为王夫之诗论的一小部分，虽然重要，但是较之于王夫之费时更长、用力更深的几部诗评选，如《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分量显得太单薄了。后三部诗评选包含王夫之更多的诗见，从中更能看出王夫之对诗的多方面见解以及精彩的评析^[1]。

《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不见于清代的《船山遗书》，它们的出版是1933年的事。这当然会影响到后人的研究，以至于后人把对王夫之诗论著作的关注只放在《姜斋诗话》上，而忽略了这三部诗选。然而我的王夫之研究，却让我思考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我们的文学批评史作者把古代文学评论的重点放错了位置。于是在我确定文学评论或文学批评的定义和范围后，观察中国文学评论史或中国文学批评史作者所取用的资料，结果发现这些著作多集中于对话语、书信、专书、序跋、笔记小说等作品的探讨，而较少论及选集、评点、诗传、论诗诗等评论类型。于是从1971年开始，我就展开了对中国文学评论史编写问题的研究，并于1974年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成果后来改写为《中国文学评论史编写问题论析：晚明至盛清诗论之考察》^[2]一书。书中我指出，中国过去的文人非常重视文学选本，在《四库全书》的排列中，集部以总集（选集）为先，受文学评论史作者所重视的诗话、笔记小说，反而被列为集部后的“诗文评”类。而且过去文人一旦成为文坛领导人，常常编选文学选本来影响文坛的风气、文风的吹向，前后七子、钱谦益、王士禛、沈德潜等都是如此。此外，中国文人平时阅读、评论，常常就在选本上进行圈圈点点、旁批尾评，这类作品数量远远超过诗话、笔记小说、序跋等著作，意见的表示也更加鲜明、具体。可是文学评论史或批评史的著作为什么不以这类选本、评点为主要

取材对象呢？本书第一篇《选集的文学品论价值——兼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3]和第二篇《清代诗学研究的反思——史著的检讨》^[4]，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我多致力于文学选集的探讨工作，希望通过我的探讨，唤起文学批评研究界对这一文学批评文种的重视。这时期我完成的选集探讨的论文有好几篇，如《李攀龙及其〈古今诗删〉研究》^[5]、《王夫之〈唐诗评选〉研究》^[6]、《王夫之评选明代诗人与诗作——〈明诗评选〉研究》^[7]、《钱谦益〈列朝诗集〉与王夫之〈明诗评选〉比较研究》^[8]等。本书第三篇《王夫之评选明代诗人与诗作——〈明诗评选〉研究》是其间发表的一篇文章，从这篇论文可以了解我整理选集的一些理念和方法。

在文学评论的体制中，还有一类是论诗诗。论诗诗，顾名思义就是评论或讨论诗的诗作。这类作品又以七言论诗绝句组诗更受当时文人重视。七言论诗绝句组诗，在前有唐代杜甫的《戏为六绝句》，其后有金元好问的《论诗三十首》，清代中叶以后这类文学评论体制更受文人的欢迎，数量之多、表现形式之众、作者企图之大，都令人难以想象。郭绍虞等人编的《万首论诗绝句》，收集自唐代至清代的论诗绝句约九千多首，其中大部分作于清代中叶以后。由于这些作品太吸引人了，故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一直沉浸其中，也根据有关材料先后完成了《杜甫〈戏为六绝句〉研究》^[9]、《姚莹〈论诗绝句六十首〉研究》^[10]两书以及多篇学术论文。从本书第四篇《研究论诗绝句的意义——以清代论诗绝句为例》可以知道我为何强调文学评论史的书写绝对不能无视论诗绝句之作。

上面说到，论诗绝句作者的企图是很大的。他们企图以此体制来讨论历代诗人诗作，来议论一代诗作，来专论某个地区的诗人与诗作，来专门评论闺秀之作，来评论《诗经》、《楚辞》，来抒发读诗话后之感想等。本书第五篇《清代中叶以后区域“论诗绝句”之建设》，以专论地区诗人诗作的论诗绝句为对象，论述清代区域论诗绝句的丰富内涵及其意义。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也多在论诗绝句的其他问题探讨上下功夫。论诗绝句有专论作家的，这方面我整理和分析了历代论诗绝句作者是如何讨论前代个别作家及其作品的，如孟郊诗、屈大均诗。前

4 者见本书第六篇《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元好问论孟郊诗与后代论诗绝句》，后者见本书第七篇《屈大均与后代论诗绝句》。

不少论诗绝句之作是有计划、有系统地来写作以及来评论诗人与诗作的。从他们的论诗作品中，可以窥测他们的诗观，我写作《姚莹〈论诗六十首〉研究》时，除了论述他如何批评历代诗人与诗作外，也论述了他的诗见。元好问是系统论诗绝句的始创者，我曾根据他的论诗绝句之作并结合他的其他作品，论析他的诗观。成果见本书第八篇《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诗观论析》。在探讨元好问的诗观上，我所取用的方法就是前文提及的以诗论者所取用的主要用语为线索来窥探其论见。除了研究元好问的诗观采用这种方法外，我在探索个别诗论者的诗见，如清代叶燮诗论的中心精神，以及指导研究生分析前人的诗歌见解时，也多采用这方法。

在拙著《中国文学评论史编写问题论析：晚明至盛清诗论之考察》中，我批评传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太过于偏重在文学论者意见的分析，以为将历代文学论者的论见串联起来，就是一部文学评论发展的历史。这种处理方法有待商榷。文学批评史正如一般文学发展史一样，绝对不是作家作品史。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言，它更应该是文学观念在历代发展的历史。因此有一段时间，我极力探讨一些文学评论界关心的文学理念，如“温柔敦厚，诗教也”，“杜诗为诗史”等理念在历代文学批评史著中的发展与变迁的情形。本书第九篇《明末清初诗文本末观念之新发展》是其中的一项尝试。

在中国文学评论的探讨上，我也采用图解的方法来分析论者的见解。例如在论析钟嵘在《诗品序》与《诗品》中对诗的发生、诗的创作、诗作者的评论及他对诗作与读者的关系的看法时，我就采用图解的方式来剖析、说明。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让人一目了然地认识到有关论者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在教学方面，这方法所取得的作用更大。本书第十篇《范仲淹的文学思想》就是采用这方法来论析批评者见解的一个范例。

在整理中国文学评论时，我常常为中国文学评论者能在数世纪前提

出的卓越、精彩的见解感到惊奇，同时也常常思考将之用在作品分析实践的可能性。本书第十一篇《若即若离，诗鉴赏的原则与方法：据王夫之的诗歌鉴赏说论析〈毛诗·关雎〉篇》举出早在17世纪明末清初时，已经有一些论者如王夫之，提出有如我们现在的读者理论的阅读见解。第十一篇中对《毛诗·关雎》篇的分析，我就是根据王夫之的诗见来论析这首诗的。

本书表面上看似在论析、评论作者的诗观，其实其中也包含了我对中国文学评论史书写的看法：对文学评论范围的认识、对文学批评新领域的关心以及对文学评论史研究方法的见解。

是为前言。

注释：

【1】详见杨松年：《王夫之诗论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

【2】详见杨松年：《中国文学评论史编写问题论析：晚明至盛清诗论之考察》，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

【3】原载陈平原、陈国球等编：《文学史》第一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4】会议论文，宣读于2000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举办的第二届明清国际学术会议：“明清研究：现状的探讨与方法的反思”。

【5】杨松年：《李攀龙及其〈古今诗删〉研究》，台湾《中外文学》1981年第9卷第9期。

【6】杨松年：《王夫之〈唐诗评选〉研究》，收于《中华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华书局八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新加坡中华书局，1992年，第130~155页。

【7】杨松年：《中国文学批评问题研究论集》，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第93~120页。

【8】杨松年：《钱谦益〈列朝诗集〉与王夫之〈明诗评选〉比较研究》，收于《王船山研究》，王船山学会，1993年，第154~166页。

【9】杨松年：《杜甫〈戏为六绝句〉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第433页。

【10】杨松年：《姚莹〈论诗绝句六十首〉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第380页。

content 目录

选集的文学品论价值——兼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 > 1 ▶

清代诗学研究的反思——史著的检讨 > 15 ▶

王夫之评选明代诗人与诗作——《明诗评选》研究 > 25 ▶

研究论诗绝句的意义——以清代论诗绝句为例 > 48 ▶

清代中叶以后区域“论诗绝句”之建设 > 72 ▶

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
——元好问论孟郊诗与后代论诗绝句 > 93 ▶

屈大均与后代论诗绝句 > 109 ▶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诗观论析 > 122 ▶

明末清初诗文本末观念之新发展 > 153 ▶

范仲淹的文学思想 > 176 ▶

若即若离，诗鉴赏的原则与方法：
据王夫之的诗歌鉴赏说论析《毛诗·关雎》篇 > 191 ▶

选集的文学品论价值

——兼评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作，一向以来，存在着颇为严重的资料掌握不足与分析方法偏差等问题，以至不能较为全面与深入地展现各个时期文学批评的面貌以及发展状况。20世纪70年代初期，当我在香港大学撰写博士学位论文的时候，已经觉察到当时所见到的几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存在上述问题，于是在论文中详加指出并提出质疑。80年代中期，我曾将论文中的部分章节略加整理，写成《诗选的诗论价值：文学评论研究的另一个方向》，发表于台北《中外文学》，希望引起台湾研究中国文学批评的同道的注意^[1]。这篇论文也收在香港三联书店于1987年出版的拙著《中国古典文学批评论集》之中^[2]。在这段期间，我也开始修订我的那篇博士学位论文，并细阅70年代初期以后所出版的各种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著作，发现过去所看到的和提过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所以也在修订论文时再加指出与批评。修订后的那篇论文，交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中国文学评论史编写问题论析：晚明至盛清诗论之考察》^[3]。近日读及简锦松《明代文学批评研究》^[4]，

- 2 书的序中也曾提及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资料取用的偏差与分析方法的失当问题；再环视近年来，从事中国文学批评工作的阵容已较过去壮大得多，也出现不少杰出的专著与单篇作品，而中国文学批评史性质的著作，依然不能很好地突破原来的局限，解决所存在的问题。因此，深感惋惜，再撰本文，以冀能引起较多与较大的反响。

简锦松在他的书中言及资料处理的重要性时说：

学术研究中，资料之取得与运用，即可决定研究品质之高下，大量新而正确之资料，殆可提升研究之水准。^[5]

书中批评一些明文学史著作如钱基博的《明代文学》与宋佩韦的《明文学史》在这方面所出现的偏差：

试考其资料来源，《明代文学》以钱谦益《列朝诗集》、朱彝尊《明诗综》、沈德潜《明诗别裁》为主要出处，故全书所引例证多为诗，而少见文章；其人物评论多采《明史》、《清史稿》及钱、朱两选之小传为根据，而参以《四库总目提要》。《明文学史》始注意文人之别集，书中每论一人，常举其集之名称；察其所举明人文集，出于四部丛刊者共十一家，南京龙蟠里图书馆所藏明刻本十八家及少量清刻本而已。此外，俞宪《盛明百家诗》亦见于引书中，钱、朱二选及四库提要，虽不见称引，而书中意见多与此合。^[6]

简君对其书之资料处理，亦加说明。简言之，有以下几点：第一，逐一详读成化至嘉靖中期在世者之别集，以考察明人所面对文学之问题。第二，总集以黄宗羲的《明文案》、《明文海》，钱谦益的《列朝诗选》，朱彝尊的《明诗综》为主。其他诗话之书，附于集部中者亦取之。第三，文集以外资料，正史以《明实录》为主，兼及《明史记事本末》、《明通鉴》、《明史稿》、《明书》；制度之书，以俞汝楫《礼部志稿》，李东阳奉敕撰《大明会典》，黄佐《翰林记》、《南雍记》为主，辅以《明会要》、《吏部考功司题稿》、《大明诏令集》；文献之书，取《国朝献征录》、《皇明名臣墓铭》；科举之书，取《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进士题名碑录》、《皇明进士登科

考》；此外，亦多方面参考方志资料，以考订人物传记。第四，于文集中，不仅取谈文学批评者，亦择取有助于说明典章制度、社会经济，而堪以描绘文坛概况者^[7]。所以简君之作，特别强调对所研究时期（成化至嘉靖）社会背景、思想背景、文人出身与交往背景、文坛概况之论析，并由此而展现那个时期文学批评之情况。我在《中国文学评论史编写问题论析：晚明至盛清诗论之考察》一书中曾论及背景研究对于编写中国文学评论史的重要性，而简君所论，实比我所论及的要更全面与深入。他所持有的态度与取用的方法，可供欲撰写文学批评史者参考。不过，要强调的是，目前文学批评史著作所出现的资料处理问题的偏差，不仅在于背景研究，更在于文学评论的论析。我尝以诗论作品为例说明这个问题。所谓诗论作品，如果是指讨论诗的原理问题、评析诗人及其诗作的文字，那么其范围当包括诗话、诗选诗汇、笺注批点、诗人小传、序跋、书信、论诗诗、笔记小说、书目提要、读书记和文集中有关的单篇论文、纪事诗、墓铭、史书与方志中的诗人传记等作品。因此表示：

各种文学批评史，在资料的处理上，多偏重于诗话、序跋、书信、笔记小说等资料，来整理中国文学批评史，而较少注意到诗选诗汇、笺注批点、论诗诗、读书记等作品。^[8]

而选集与笺注批点，实为过去中国文学批评极为重要的一环。编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者，多忽视这一重要环节而编述中国文学批评史，实令人慨叹。这也是我特写《诗选的诗论价值：文学评论研究的另一个方向》一文的原因。文中所强调的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选集是中国文学批评作品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部分，但并没有获得应得的重视。

选集可包括搜罗浩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的全面收集一个时期的作品的汇编和“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的经过删选的选本^[9]。前者如顾嗣立（1665—1722）的《元诗选》，后者如沈德潜（1673—1769）的《明诗别裁》。不论汇编者或删选者从哪个立场、哪个角度进行汇编或删选作品，这种行为本身往往反映了他们的文学观

中国文学评论史书写问题论集

- 4 点。如顾嗣立汇辑元诗，目的即在澄清一般人对元诗的误解，说明元诗在中国诗发展的历史河流中与宋诗有不同的特点，并具有上接唐、宋诗，下启明诗的承传作用，而不只是存诗与存人而已^[10]。沈德潜《明诗别裁》选辑的目的，除突出他所肯定的诗人与诗作，标示明诗发展的正变盛衰情况之外，亦肯定明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它具有古风，其成就“陵宋轹元而上追前古”^[11]。

选集在古代中国的地位是极高的。王瑶曾经指出：中国人一向不太注重诗文评，他们对诗文的意见，常常寓于总集之中，因此一部《文选》对中国诗人与文人的影响，远远超过任何一部诗文评之作^[12]。我们可从过去的文学活动来鉴定它的真实性。过去在诗文创作有一定成就、在文坛有一定地位的写作者，往往通过他们的选集来表达对诗文的看法，由此奠定他们在文坛的地位。在晚明至盛清这段时间，名作者如钱谦益（1582—1664），就有《列朝诗集》、《吾炙集》之选，朱彝尊（1629—1709）有《明诗综》，王士禛（1634—1711）有《古诗选》、《唐贤三昧集》、《十种唐诗选》、《唐人万首绝句选》、《感旧集》之作，沈德潜有《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国朝诗别裁》之选。选集之作，对文学批评影响很大。《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明别集，就多征引朱彝尊《明诗综》的有关论见^[13]。钱谦益《列朝诗集》出，朱彝尊不满意钱谦益的选录与持论态度，乃另选《明诗综》以“纠其谬”^[14]。钱谦益的另一部选同时期诗友的作品《吾炙集》出，王士禛承其余绪，另编其同时诗友之作《感旧集》。沈德潜编《国朝诗别裁》，取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作品^[15]，其弟子王昶（1724—1806）觉得意义重大，乃作《湖海诗传》^[16]。王昶选诗论诗极重沈氏之说，故为后代学者所嗤^[17]。

诗文选集还可反映一代诗风。明代崇古、唐诗而贬斥宋、元诗。这固然是前后七子之主张，但在诗选上也有鲜明的反映，如张之象（1496—1577）的《古诗类苑》、《唐诗类苑》；冯惟讷（1513—1572）的《古诗纪》、《唐诗纪》；臧懋循（？—1621）的《诗所》、《唐诗所》；李攀龙（1514—1570），后七子领袖，其《古今诗删》之作，只取古诗、唐诗与明诗，全不取宋、元诗。其后万历朝的钟惺

(1574—1624)、谭元春虽然不崇七子，但选编历代诗作，也只取古诗与唐诗，而不及宋、元诗，所以只有《古诗归》、《唐诗归》之作。崇祯朝之陆时雍（生卒年不详）有《古诗镜》、《唐诗镜》。近几年来，我较为注意各种明诗选集，并为这些选集作“提要”，结果发觉这类选集的数目比预想的还要多，共百余种。从这些选集之中，我们可以了解选者对待选集的认真态度、他们选诗的不同标准、选者对于明诗整个发展的意见以及不同选集所反映的选者的不同诗观。明诗选集已是如此，唐诗选集、宋诗选集的数目尤多，从这些选集中，更可以发掘选者的种种观点和意见。

第二，选集所包含与反映的选者的文学见解，宜通过更仔细地阅读及采用各种有效的方法整理与分析。

上面提及，选集虽说包含与反映了选者对有关诗文作者和作品的看法、评价以及选者对整个诗文发展的意见、批评，然而，如果不仔细地阅读与采用有效的方法整理与分析，实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对诗文选集选录诗文作者与作品数量的统计与比较，是探测选者的诗文观点与对有关诗文作者与作品评价的一个方法。例如从钱谦益《列朝诗集》选诗数量的统计，得知他选诗最多的五名诗人为：1. 高启（1316—1374），864首；2. 刘基（1311—1375），559首；3. 李东阳（1447—1516），347首；4. 杨基（1326—1378？），327首；5. 袁凯（生卒年不详），304首。参之《列朝诗集》中之诗人小传，钱氏亦大力赞扬上述诗人。如引王子充之言赞美高启之作云：

季迪之诗，隽逸而清丽，如清空飞隼，盘旋百折，招之不肯下；又如碧水芙渠，不假雕饰，儵然尘外。^{〔18〕}

又引李东阳之言云：

国初称高、杨、张、徐。高才力声调过三人远甚。百餘年来，亦未有见卓然有过之者。^{〔19〕}

赞刘基之作云：

（刘基）为诗，悲穷叹老；咨嗟幽忧。昔年飞扬磅礴之

气，澌然无有存者。岂古之大人志士，义心志调，有非寻常什帛可以测量其浅深者乎？呜呼！其可感也。^[20]

他赞扬李东阳、杨基、袁凯，亦给予高度评价。

沈德潜《明诗别裁》选录诗篇最多的前五名诗人为：1. 何景明（1483—1521），49首；2. 李梦阳（1472—1539），47首；3. 王世贞（1526—1590），40首；4. 李攀龙（1514—1570），35首；5. 谢榛（1495—1575），26首。沈氏《明诗别裁序》评明诗各时期之诗人云：

宋诗近腐，元诗近纤，明诗其复古也。而二百七十余年中，又有升降盛衰之别。尝取有明一代诗论之。洪武之初，刘伯温之高格，并以高季迪、袁景文诸人，各逞才情，连镳并轡，然犹存元纪之余风，未极隆时之正轨。永乐以还，体崇台阁，骫骳不振。弘、正之间，献吉、仲默，力追雅音；庭实、昌谷，左右骖靳，古风未坠。余如杨用修之才华，薛君采之雅正，高子业之冲淡，俱称斐然；于鳞、元美、益以茂秦，接踵曩哲，虽其间规格有余，未能变化，识者咎其鲜自得之趣焉。然去取菁英，彬彬乎大雅之章也。自是而后，正声渐远，繁响竞作。^[21]

因此，沈氏特别推重“力追雅音”的何景明与李梦阳和能“接踵曩哲”的李攀龙、王世贞与谢榛。受钱谦益力赞的刘基与高启，因其作“犹存元纪之余风”，所以居于何、李、王、李、谢之下。相反，钱谦益诋诃七子，对七子中之代表作者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及李攀龙评击尤烈。如斥李梦阳的诗文及有关诗文论之主张，为模拟剽贼，为婴儿学语，为桐子洛诵，断绝天下读书种子^[22]；讥刺何景明的诗说，使后代谬学泛滥，令后生面目偃背，不知向方^[23]；评李攀龙僻学自师，封古为是，并揭发其诗作之种种缺点^[24]；不满王世贞早年与李攀龙互相推挽^[25]。所以选四人诗，分别为：何景明，102首；李梦阳，50首；王世贞，70首；李攀龙，25首，与刘基、高启受选之诗数，恰成鲜明对照。

我也曾就几部诗选进行个案的分析，更感到选录作者与作品数量

的统计与比较，确实有助于探测选者的诗观及其对有关诗人与诗作的评价。如李攀龙说：“文自西京以下，诗自天宝以下，皆不足观。”所以在《古今诗删》的唐诗部分，选诗最多的八位诗人中，盛唐诗人就占了七位：杜甫、李白、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另一位是初唐诗人沈佺期。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所选的742首唐诗中，这七位唐诗人的作品，就占了325首，将近一半。而对唐代七古，李氏推崇杜甫，认为其作品“不失初唐气格而纵横有之”，对李白七言之作，则有微辞，认为“往往强弩之末，间杂长语，英雄欺人耳”。于近体，七言律诗方面称赞王维、李颀，而认为杜甫的这类作品，“篇什虽众，愤焉自放矣”。于五言绝句，则嘉许李白的作品，“实唐三百年一人，实以不用意得之”。揆之选诗数目，情况也是如此。在七言古诗中，选杜甫这体诗章最多，共21首。由于对李白七古不表好感，因此只取他的作品8篇而已。而七言律诗方面，也选王维的这体诗章最多，共11首，李颀7首，仅次于李白的13首。而王维的11首和李颀的7首，是他们各体诗中受选最多的。相反，由于对杜甫七律不表好感，因此只取一首。李氏盛赞李白的五七言绝句，所以在七言绝句中，选李白诗18首，仅次于王昌龄的19首；在五言绝句中，选李白5首，仅次于王维和韦应物的6首^[26]。就总篇数来说，李氏选杜甫最多，共82首；其次李白，70首；王昌龄第三，40首。多选杜甫的作品，也和前后七子盛赞杜甫的见解相合^[27]。

分析王夫之的诗评选集，不但可以了解到他对初唐诗人与盛唐诗人的高度推崇，而不满意中晚唐诗作；了解到在芸芸众多的唐代诗作者中，他所欣赏的诗人与诗作；了解到他对所推崇的诗人所写的不同诗体的不同评价；而且也让我解决了一个在《姜斋诗话》与《诗广传》中曾经发现而不能解决的问题：有时高度称赞杜诗，有时却又极度贬低杜诗。问题的关键，即他所称赞的是杜甫入夔以前的诗作，而不满意入夔以后的作品，这都充分显示在他的《唐诗评选》的选诗数字中^[28]。此外，从王氏的《明诗评选》我们还可以了解到他对明代诗歌的发展有“三变”的看法，以及在整个明代诗歌发展的长河中，他又是如何赞赏前期的高启、刘基、杨慎、杨维桢的作品与稍后苏州文坛的徐渭与祝允

8 明等人之作的。他对“三变”的主要人物，甚为赞扬公安的三袁，极为贬斥竟陵的钟惺与谭元春，其中对钟惺，更是施予无情的笔伐。他也非常不满前后七子，但对前后七子的领袖人物何景明、李梦阳、王世贞、李攀龙四者之间，亦有不同看法。他批评李梦阳诗不能具六义之旨，才能在公安之下^[29]；批评何景明诗风莽撞，为“浑”一字所误，才品在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之下^[30]；批评李攀龙时，时有赞许之语，但仍惋惜他的诗风粗豪浅率^[31]；对于王世贞，虽以其诗作还不至掉落囂豪咆哮的泥坑，可是诗品卑弱，欠缺思致，而且只是着重于局面的形式铺排^[32]。因此选四人诗的情况是：李梦阳，8首；李攀龙，6首；而何景明与王世贞，各1首^[33]。

通过选集选录的诗篇与对选者如何选诗的观察与分析，也可了解选者的诗文观点。选者在删汰或录取诗文作品时，选择的态度是非常认真的。他们承认选汰作品是一项艰难的工作，邹迪光序华淑（1589—1643）的《盛明百家诗选》就详细说明了这一点：

为诗非难，选难。选诗非难，选今人诗难。盖有去取，则有爱憎，取未必爱而去无不憎，任爱寡而任憎多，难也。雕虫名高而刷青未出，帐中之秘，无由觅之，难也。能诗者未必真能诗者，吾以名取而人以实求，实不如名，不以为阿则以为瞽，难也。截赞而求介绍。以请冀一厕而名其间，而许之不可，不可不能，难也。肆口嘲讥，解忌抵讳，强而入之，人不作者憾而厕者憾，难也。本名流而或姻无韵，不姻有韵，因无韵而及有韵，即识者以为然，而于吾心不然，信人不自信，难也。海人词人夥矣，不宜一失，而况百漏，即千手千足，历殊域而网罗之，虞穷年皓首之不逮，难之难者也。若其识亏罔象，见局离黄，昧雌雄之神铄，忽山水之绝调，不能诗而论诗，斯之为难，又所勿论矣。^[34]

因此，当选录作品时，编选者非常小心。如《皇明诗选》的编者不满李梦阳的近体诗，所以在录取李氏的这类诗作，编者之一的李雯就曾表示：“我辈去取之际，极有甄汰。今之所录，皆见其英分者也。”^[35]另一编者宋征舆亦云：“献吉七言绝，拟少陵者甚多，以不